

清初小说对古文的渗透： 以小说为古文辞

庄逸云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在清初,由于小说持续发展,主流与非主流的文人皆对小说持有较为包容的态度,因此小说向古文的渗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清初的一些古文名家如侯方域、魏禧等在理论上承认虚构的合理性,重视细节的描写,其古文创作论在一定程度上趋同于小说创作论;其二,在创作实践上,不少文人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即将小说的旨趣与笔法注入古文的写作中。清中叶兴盛的桐城派立足于“整肃”散文,这使得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逐渐消退。

关键词:清初;小说;古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3-0068-06

自小说产生伊始,小说与古文虽然关系颇深,但对彼此的影响并不对等。古文具有正统文学的地位,小说作者或评论者往往会从古文尤其是史传散文处汲取养料;至于小说,则向来被视为“小道末技”,对古文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到了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被打破了:小说向古文的渗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清初的一些古文家纷纷“以小说为古文辞”。关于这个现象,从清初古文家汪琬的一段话中可以管窥:“小说家与史家异。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也……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1]786}朝宗即侯方域,于一即王猷定,二人

作为清初的古文名家,皆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尽管汪琬对此深表不满,但他的这段话无疑客观地揭示出清初古文家受小说影响甚深的事实。那么,清初小说向古文渗透的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具体情形又如何呢?本文将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厘清。

明代中后期,小说繁兴,清初亦延续了这股势头。白话小说方面,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一时,文言小说方面,“明末实弥漫天下”的传奇风韵“至易代不改”^{[2]146}。在此背景下,清初文人对小说的接受度普遍提高,他们的小说观也渐趋多元化。当然,对于白话小说,正统文人在表面上大都依然是不屑的,他们

收稿日期:2010-01-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项目编号:07SA010)及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09XZW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庄逸云(1975—),女,土家族,重庆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在站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近代文学。

愿意谈及甚至操觚的还是可以位列四部的文言小说。

康熙朝的文坛领袖王士禛尽管以诗歌名家,但也十分醉心于阅读和写作小说。他曾为《唐摭言》、《唐阙史》、《世说新语》、《侯鯖录》、《清琐高议》、《清暇录》等一系列小说写过序跋,还亲自操觚创作了《池北偶谈》、《香祖笔记》等笔记小说。当然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他曾与蒲松龄有交谊,并批阅过《聊斋志异》。王士禛曾谈到自己写作小说的动机,即希望“大之可以畜德,小之可以多识”^[3],其《香祖笔记》“要必贯穿经史、表章文献,即一名一物,异日可重典故、备法戒者,乃录之,否则略而弗书”^[4]。由此可以看出王士禛对小说“资考证、广见闻、寓劝诫”功能的重视,这自然是相当传统并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小说观念,正统文人之所以接纳小说,也往往是以此为前提。前面提到的古文家汪琬尽管对“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颇不以为然,但他本人亦效仿《世说新语》写作了轶事小说《说铃》。有人质疑他写此书是“市奇吊诡”,“何吾子著录之不伦也”,他的回应是:“方其下俚直勾休沐也,则必丝竹以谐耳、妖冶以悦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张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视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萧然闲然,于丝竹无有也,图史而已;于妖冶无有也,蓬垢而已;于樗蒲博塞无有也,故簏败几而已。然且无以自娱,其若穷愁何?于是追忆旧闻,手纂口诵,不丝竹而谐、无妖冶而悦、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然忘返者,诚不知其不可也。”^[5]⁴⁵⁶汪琬将小说等同为丝竹、妖冶、樗蒲博塞之具,这种视小说为娱乐消闲之工具的观念几乎与小说的发展史相始终,自然也极有代表性。

相较于以上二人,清初的另一位文人尤侗对小说的接受度更高,其小说观也显得较为新异。尤侗曾任职翰林院检讨、分修《明史》,具有官方文人的身份,但他与当时的小说界似乎往来密切。小说家张潮“时贻尺素以所著书相质”^[6],他也曾为张潮所编的《昭代丛书》写序。尤侗本人所创作的《瑶宫花史小传》和《雪衣女传》是两篇典型的传奇小说,前者写他与一乩仙的情缘,情节妄诞、语言华美、描写细腻,秉承了唐传奇旨在“文采与意想”的特点,后者则沿袭的是宋人传奇《杨太真外传》、《绿珠传》的路数。这两篇小说皆被尤侗收入自己的《西堂文集》中。敢于将小说收入文集,与序、论、铭、赋、骚等文体并列的人在古代并不算多,尤侗此举多少是有些勇气的。

尤侗也不吝于公开表达自己对小说的喜爱和揄扬:“六经而后百氏繁兴,稗官野史皆助丛谈,杂纂方言并供绝倒,未可执其一说芟彼诸家矣。”“《虬髯》《红线》争《游侠》《刺客》之奇,《诺皋》《杜阳》竞《汲冢》《越绝》之奥。”^[7]¹⁸⁹将唐传奇的名篇与《史记》并举,将具有杂俎性质的笔记小说与古代经典的杂史、杂传相提并论,并认为今不必不如昔——尤侗张扬小说价值、提高小说地位的意图十分明显。

以上的三位文人皆处于主流文化圈,具有正统文人的色彩,无论小说观是沿袭了传统还是趋向于新变,他们均表现出对小说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这种情况表明,清初的正统文人对小说有了较为包容甚至认同的姿态。至于主流之外的文人如毛宗岗、张竹坡、蒲松龄等,则对小说持有更加接纳的态度。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表达了他的创作动机:“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8]这种以小说倾泻个人孤愤的观点,实则使小说承载了传统诗文的功能,无形中使小说的文学品格得以升华。总之,清初的小说持续发展、文人的小说观趋于多元,尤其是主流文人对小说的接纳度提高,以此为前提,小说向正统文学特别是古文渗透也就势所难免了。

一

二

小说向古文渗透,最为直接的体现正是“以小说为古文辞”。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小说当为文言小说,白话通俗小说与古文的差异甚大,并无多少可比性。文言小说中的传奇一体脱胎于史传,因此大都以“传”或“记”名篇,古文中也有“传”、“记”两类文体,诚如汪琬所说,这亦是“史家之体”,所以,文言小说与古文在一定意义上可谓同源。当然,同源并不等于同构,二者在笔法和旨趣上是有诸多区别的。小说绝不排斥虚构,且在对细节的描写方面充满了想象力;小说的题材与主题可能无关弘旨,作品的存在或许仅仅是为了满足小说家个人的意想而已。古文中的传、记则不同,它依然秉承的是史家的实录精神,追求事件的真实性和主题的重大性;古文也可以为小人物立传,但其主题可能与表彰忠孝节义等精神攸关;古文也可以描写细节,但强调真实与简练,文笔不可“流宕”。因为同源,所以文言小说与古文

的界限其实并非泾渭分明,譬如柳宗元的部分传记文就被汪琬认为“有近于小说者”：“前代之文有近于小说者,盖自柳子厚始。如《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之属皆然。子厚文气高洁,故犹未觉其流宕也。”^{[1]785}在汪琬看来,事件是否虚妄也许难以判断,但为了保持古文的纯洁,古文家必须用笔简练、“文气高洁”,断不可如好事者那样在事件的奇异处津津乐道、大肆渲染。

所谓“以小说为古文辞”,就是作者在写作古文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了小说的旨趣、采用了小说的笔法。在小说持续发展、小说观趋于多元的大背景下,清初的一些古文家在探讨古文创作规律的时候,其论调趋近于小说的创作论。是否虚构及在细节的描写上是否注入了太多的想象、大肆铺陈,这是区别古文与小说的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可以看到,清初的一些古文家在这两个问题上持有空前宽容的态度。

魏禧是清初的古文三大家之一,其创作观很值得注意。当时有人批评魏禧所作的家传、志铭等文字有过情失实之嫌,魏禧为自己辩护道:“抑史传之作,所以纪善恶也。善恶之人往矣,而必书者,所以备法戒也。今曰某也善,其善事可为法,则法之已矣,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今曰某也恶,其恶事可为戒,则戒之已矣,不必其恶果出于某也。是故真与伪之可辨者,不可以不辨,无所从辨者,得法戒之意而存之。其名氏等于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所称道,则亦庶乎其不可废矣。”^{[9]465}古往今来,史家无不以实录为撰写史传文的根本宗旨,其撰述一旦失实,则往往贻笑天下。但魏禧显然并不在乎这一点。他认为只要文字可备“法戒之意”,是否实有其事并不太重要,所谓“不必其善果出于某也”、“不必其恶果出于某也”。过去也有文人将虚构引入史传文,写作了寓言一类作品,但作者也往往会自嘲为“游戏笔墨”,很少有人像魏禧这样公然地为史传文的虚妄失实辩护。根据魏禧的观点,主观虚构自然很容易在古文中滋生——只要“得法戒之意”即可,至于事件是来自于事实还是出自于想象又有什么要紧呢?如果史传文不排斥虚构,那么史传文趋同于稗官小说也就势所难免了,当然魏禧对此并不在乎:“其名氏等于庄列之寓言、稗官小说所称道,则亦庶乎其不可废矣。”

同为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的侯方域,则是对古

文的细节处理问题有特别的理论关注。他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表示:“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10]650}对“闲漫纤碎”之处动色而陈、对“大议论”则数语发挥而已,这与小说注重细节、强调思想倾向从情节与场景中自然流露的创作论何其相似!过去亦有散文家如归有光等注重对琐碎细节的刻画,但他们往往用笔简练雅洁,很少如侯方域倡导的那样“凿凿娓娓”、“动色而陈”。侯方域的创作论无疑相当“危险”,它很有可能使古文的写作向小说靠拢,从而“伤及”古文的纯正性。当时的另一位古文家彭士望曾就此提出批评:“即文字写生处,亦须出之正大自然,最忌纤佻甚或诡诬,流为稗官谐史。敝乡徐巨源之《江变纪略》、王于一之《汤琵琶》、《李一足传》,取炫世目,不虑伤品。其文纵工,未免携琬毅易羊皮,终必为明眼人所厌弃……朝宗闲漫纤碎、动色而陈之言,不善用之,其流必至为徐、王之失,即朝宗小传,亦不免见其疵颣。”^{[11]469}彭士望对侯方域的创作理论及实践皆提出质疑,并对其理论可能在社会上产生的“不良导向”深表忧虑,这其实已间接透露出“稗官谐史”对于清初的古文写作者有着巨大的诱惑力。

无论是魏禧对虚构的认同还是侯方域对细节的强调,都与小说的创作理论非常接近。正是在诸类创作观的直接指导下,“以小说为古文辞”成为清初古文写作的一个重要倾向。

三

清初的一些古文名家纷纷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开风气之先者当首推王猷定,其古文名篇《汤琵琶传》记叙了一位民间艺人的传奇人生,行文很有特色。且看以下一段选文:

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鬻篲,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鬻篲声,闻者莫不限涕。及旦,一邻妇诣楼上曰:“君岂有所感乎?何声之悲也!妾孀居十载,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篲帚为君妇。”应曾(汤琵琶名汤应曾——引者注)曰:“若

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襄王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蓬牖,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已归省母,母尚健在,而妇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待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12]504}

这一段文字的确呈现出不少的“小说习气”:其一,作者着力于细节的描写,用笔虽然不至于浓墨重彩,但很注意点染,文中的细节部分可谓哀婉动人;其二,所叙述的事件有颇为妄诞之处,尤其是荡琵琶之妇的来历很有神怪的色彩,而对此加以渲染似乎正透露出作者矜奇尚异的心理。另外,作者为一个小人物立传,无非是为了发表有才华者沦落不偶、知意者难求的感慨而已,这与大多数史传文的立意相去甚远。就全篇来看,作者的叙述带有相当浓郁的感情色彩,也已然失去了一般史传散文的客观冷峻特质。王猷定的其他作品如《义虎记》、《李一足传》、《孝贼传》等皆被讥讽为不脱“小说习气”,也都被收入了当时的小说选本《虞初新志》中。

好“以小说为古文辞”的古文名家当然还有侯方域和魏禧,二人均有多篇作品被当时的小说选本收录。侯方域的《马伶传》写一伶人经过三年的揣摩观察,最终精进其艺并一雪前耻。作者在描写时十分注重气氛的渲染和前后的对比,如前番李伶表演时,“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三年后马伶表演时,“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13]16}。整个事件虽然与忠孝节义等宏大的主题无关,但饶有趣味,作者的叙述亦很有几分曲折,以致于侯方域的朋友在评点此文时反复用了“奇人”、“奇举”、“奇想”、“奇事”^{[13]16}这类字眼。侯方域的《郭老仆墓志铭》一反通常墓志铭特有的矜重风格,对墓主的传奇经历铺排渲染,尤其是对细节与场景的描写酣畅淋漓,体现出作者尚奇的心理及炫笔弄巧的意图。魏禧的《大铁椎传》无论是题材还是审美的旨趣,都与唐传奇名篇《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等一脉相承。作者如此写大铁椎与众贼的决战场景:“时鸡鸣月落,星

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鬣策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我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描绘至此,作者宕开一笔,写隐伏于一旁的看客“屏息观之,股票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但见地尘起黑烟,滚滚东向驰”^{[14]104}。此段描摹可谓“奕奕有生气”,极尽顿挫虚实之妙。全篇对于大铁椎的神秘莫测和武艺高超极尽皴染之能事,作者专注于人物及事件的传奇性,而这与“文以明道”的正统古文观其实已背道而驰。

上述三人在清初的古文领域名气极大,他们的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示范作用。受其影响,清初的一些文人在进行古文写作时,也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小说笔法。顾彩的《焚琴子传》与王猷定的《汤琵琶传》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为沦落不遇的民间奇人立传,作者注重细节描写,尤其是对传主的高超琴艺有绘声绘色的描绘,所叙写的事件同样间涉虚妄。如作者写某将军延请焚琴子弹琴的场景:

将军据上座,而置一座于旁,命生坐。生怒目视将军曰:“吾博通万卷书,而明公惟知马上用剑槊。吾岂为若门下士耶?奈何不以宾礼见而屈于旁?吾不能鼓琴矣。”奋衣径出不顾。将军惭,下与抗礼谢罪,强留之。乃距上坐,为一鼓琴,将军称善,左右无不竦听,然其声凄怆噍杀,有秦音焉。生曰:“吾琴凄凄如鸾凤鸣,今枝上无螳螂捕蝉,而弦中忽变西北肃杀声,何也?岂军中殆将有警耶?”抚琴毕,三军之士皆为嗟叹,有流涕者。生尽醉痛哭,上马而去。赠之金,不受。后此军沦于海澄焉。^{[15]63}

此段描写十分生动,无论是焚琴子的洞见之明还是其琴音的魅力都颇有传奇色彩。作者还在篇末如王猷定一样,既交代立传的始末,也发表了情感强烈的议论。周亮工与王猷定相契,且对王的古文甚为推崇,他本人也有多篇史传文字如《盛此公传》、《唐仲言传》等透露出较明显的小说气息。另外,徐士俊的《汪十四传》写一豪侠的风采,可与魏禧的《大铁椎传》对比阅读。秦松龄的《过百龄传》、陈鼎的《八大山人传》、方亨咸的《武疯子传》等作品都写民间的奇人奇事,且不惜于细节描写处曲尽情致,均呈现出以

小说为古文辞的痕迹。

概言之,清初古文对小说的借鉴和吸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作品所叙写的事件之全体或部分可能妄诞无根,有悖于史家的实录精神;其二,作者不惜在细节或场景的描写上藻绘铺排,充分营造故事的现场感,这大大降低了作品的实录意味,而增强了作品的虚构色彩;其三,作者的创作旨意可能与“传道”、“明道”无涉,作者之所以为无关宏旨的小人物立传或津津乐道于“街谈巷议”,或者是借以宣泄孤愤,或者仅仅是为了猎奇和炫笔而已。还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文人如侯方域、魏禧等在古文写作中能不拘一格、杂采旁搜,他们是自觉、有意识地以小说为古文辞,而有些文人则是受文坛风气的熏染,他们吸纳小说因素的行为往往是不自觉的。如康熙朝的文人陈鼎以撰写私史的态度编纂传记文集《留溪外传》,旨在以作品扬善、成为国史之补。“大抵国史所必及者,私史不必复详;国史所不及者,私史所不容或略。而总不外乎是非之公,使读之者咸有以想见其为人,而欣欣然鼓舞于为善之乐。此亦吾人著书之微权也。”^{[16]405}但作品编纂成后,竟然有多达13篇的篇目入选当时的小说选本《虞初新志》,《四库提要》也讥其“怪异诸事尤近小说家言,不足道也”^{[17]832}。作者的主观愿望是进行严肃的古文写作,但作品在客观效果上却趋同于小说,类似的情况在清初不乏其例。

四

清初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是俗文学向雅文学渗透的结果。这种渗透在当时就遭致了不少正统人士的批评,那些带有小说习气的古文屡屡被讥讽为“不雅驯”、“流为俗学”、“伤品”。将小说的旨趣和笔法引入古文,的确可能不利于古文维持雅正的风格,但古文的风格本来就可以多样化,给某一种文体

规定一个唯一合适的风格无疑会限制这种文体发展。与过去很多朝代的初期散文相比,清初的散文应该说是摇曳多姿、成就斐然的,这与清初的创作风气自由、文人愿意向包括小说在内的其他文体借鉴有很大的关系。相较于传统的古文,因其所叙事件的传奇性和叙事风格的细腻,这些带有小说习气的文字往往显得更具有趣味性,也更易于获得一般读者的喜爱。有人在读了《汤琵琶传》后就老实承认:“近人讥侯朝宗、王于一为文不脱小说家习气,殆指此等文而言。然其文实妙,读书焦苦时偶一阅之,不啻琵琶声闻于耳畔也。”^{[12]505}

清代中叶桐城文派兴盛,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便逐渐消退并臻于终结。自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开始,清廷就不再只是满足于“治统”,而是着手谋求“道统”,即加强对思想界的控制,桐城派就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桐城派在乾嘉年间的代表人物曾立足于“整肃”散文——在思想上要求贯彻程朱理学,在行文风格上要求“雅洁”。对于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桐城派的奠基者方苞很是不满:“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18]890}为了“整肃”散文,方苞提出了颇为严格的审美规范:“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佻巧语。”^{[18]890}在思想内容方面若以程朱理学为准的,文人则不可能恣意地为无关弘旨的小人物立传,以宣泄个人的牢骚或仅仅是满足矜奇尚异的心理;在行文风格上若以雅洁为规范,文人则很难在细节的描摹方面贯注想象并进行大肆敷衍。因此,当桐城派大行其道的时候,以小说为古文辞的现象就难以为继了。虽然在清代中叶及之后,仍不乏人好以小说为古文辞,但仅属个案而已,已很难集结为突出的现象。就整肃散文的层面而言,桐城文派似乎功过兼有,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论题了,兹不赘言。

参考文献:

- [1]汪琬.跋王于一遗集[G]//钝翁前后类稿:卷4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王士禛.池北偶谈序[M]//池北偶谈: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宋攀.香祖笔记序[M]//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汪琬.说铃小序[G]//尧峰文钞:卷2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6]尤侗.昭代丛书甲集序[G]//张潮,等(辑).昭代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7] 尤侗. 西堂杂组一集自序[G]//西堂文集. 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 蒲松龄. 聊斋自志[M]//聊斋志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9] 魏禧. 答友人论传志书[G]//魏叔子文集外篇:卷 6//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8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 侯方域. 壮悔堂文集:卷 3[G]//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5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1] 彭士望. 与魏冰叔书[G]//李祖陶(辑). 国朝文录:耻恭堂文录:卷 1. 续修四库全书:第 166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2] 李祖陶(辑). 国朝文录:四照堂文录卷 2[G]//续修四库全书:第 166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3] 侯方域. 马伶传[G]//壮悔堂文集:卷 5//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6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4] 魏禧. 大铁椎传[G]//魏叔子文集外篇:卷 17//续修四库全书:第 1409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5] 顾彩. 焚琴子传[G]//张潮(辑). 虞初新志:卷 4. 北京: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 [16] 张潮. 留溪外传序[G]//陈鼎. 留溪外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22 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7] 纪昀. 留溪外传提要[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122 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8] 方苞. 方苞集[M]. 刘季高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On Fictional Style Permeation Among Ancient Free Essay Crea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UANG Yi-yun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nesses an unprecedented situation where the fictional style permeates among the ancient free essay creation resulted from the tolerance of fiction on the part of both the mainstream and non-mainstream literati along with the fiction development, 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some famous literary figures at that time such as Hou Fangyu, Wei Xi, etc. theoretically acknowledge the reasonability of fiction and stress elaborate description, whose ancient free essay creation theories are in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fiction creation to certain ext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ir ancient free essay creation some literati adopt fictional style and purport. The permeation fades away when the Tongcheng School “purges” the ancient free essay creation of fictional style.

Key words: early Qing Dynasty; fiction; ancient free essay; Tongcheng School

[责任编辑:唐 普]